

剔图刻像

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与成像方式

■ 郑立君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剔图刻像

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与成像方式

■ 郑立君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剔图刻像: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与成像方式/郑立君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624-5273-7

I. ①剔… II. ①郑… III. ①画像石—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1962 号

剔图刻像

TITUKE XIANG

——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与成像方式

HANDAI HUAXIANGSHI DE DIAOKE GONGYI YU CHENGXIANG FANGSHI

郑立君 著

责任编辑:张菱芷 戴倩倩 版式设计:周 晓

责任校对:贾 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25 字数:250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5273-7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在中国美术史上,汉画像具有特殊的地位。从万年前的原始陶器及其后的彩陶、三代青铜器、秦汉漆器到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刻,先民们是以造物和设计的方式记录生活、表达诉求、寄托理想、抒发情感。直到纸张和丝帛一类作为绘画载体出现和使用之前,艺术的造型和纪录大多依赖于造物、依附于器物,这种依赖和依附的基质大多是立体的,不仅陶器、青铜器、漆器一类的器物如此,集中反映和表现汉代绘画和装饰艺术水平的汉画像也依附在石质建材上,准确地说是建筑与绘饰艺术结合的产物,是平面图像与立体石质结合的产物。其实,更早已经有平面基质(丝帛类)上的绘画和书写了,为什么汉代人还要将图像镌刻于石头上呢?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建造又装饰,既实用又审美,既建筑又绘画、既构造又言说。墓因石材(砖材等)而构筑,意因图而表达。

汉代这种大规模地在石质建筑上以壁画的形式表达历史和愿望的方式前所未有,但陶器上的刻画、绘饰,青铜器上的凿刻、镶嵌足以为此提供经验,因为在汉画像石刻兴起之时,中国人在陶器上镌刻、绘画以及在铜器上书写记录已经有数千年历史。而另一个至今仍未引起重视并获得结论的是石刻的外来制式、影响。若有,似乎两河流域、埃及的石刻工艺和表达方式是其借鉴。是否如此,仅为猜测而已。

在我个人的关联中,张道一先生长期致力于汉画图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受业于张先生的我,受其影响对汉画图像也产生了很大兴趣。20世纪80年代曾沿江苏徐州北上山东、北京,后南下南阳、四川诸地,睹画像风彩,聆研究者之言,并与山东嘉祥的朱锡禄、济南汉画馆的蒋英炬诸先生相识。但终因无缘也无力从事这一令人惊羨的研究事业。

近几年,张道一先生多年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出版,如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画故事》、《画像石鉴赏》等。此前更有资料性的《画像石全集》等大型丛书问世,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崭露头角,连同海外学者的努力,汉代画像艺术的研究渐成一门显学。

本书作者郑立君,曾受业于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近两年时间便完成了这本新著。从著作看,作者从设计和工艺的角度来研究汉画像艺术的发生、发展及其艺术特点,有诸多新意和创建,无疑为当代的汉画像研究又提供了一力作。立君为人朴实,为学勤奋,能有此成果足以表明这一点。我与汉画像研究有相当大的间隔,本无缘置喙,但立君心诚意恳,嘱我为序,免为其难,谈一些杂感于此,唯望立君今后能继续此课业,将其研究深入下去。

李砚祖

2009年8月29日于北京集虚斋

前 言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的一种综合性造型艺术,即它体现和折射出了两汉及此前的绘画、雕刻、建筑、装饰艺术和工艺设计等发展的水平、特点与思想。在造型艺术分类学中,如果依据传统的中国造型艺术的分层而论,汉代画像石应属于民间美术这一基础层次,其本体即民间美术。但民间美术涉及的范围与种类是相当宽泛和多样的,且汉代画像石也是以汉代的丧葬礼俗为契机产生与发展的,属于汉代的民间丧葬雕刻工艺,因此,本书把汉代画像石界定在民间丧葬工艺的范围内进行论述。

本书研究立足于汉代画像石的本体即从民间雕刻工艺与民间美术成像方式角度切入,以它的雕刻工艺过程、图像建构方式和汉代的经济、政治思想、忠孝观念、神鬼迷信、升仙信仰和厚葬社会风气,以及豪族阶层(也包括一些平民百姓)生活方式与雕刻工艺与图像建构的关系等为经线;以它的雕刻工艺技术与思想,人物、衣冠服饰、动植物、车舆、建筑和装饰图案等成像特点与思想,以及它的雕刻工艺、人物的衣冠服饰、车舆、建筑图像和装饰图案等反映和折射出的汉代和中国古代工艺设计思想等为纬线,展开论述。

理论上,本书基于这样的假设: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具与汉代钢铁冶炼技术、选材、石料加工、粉本、雕刻技艺和彩绘等工艺程序是其雕刻工艺与图像建构的物质手段与基本方法,也是其图像最基本的显性成像方式;汉代画像石的不同制作群体即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的艺术思维方式、创作方法、审美观念是其雕刻工艺与图像建构的主导思想,也是其图像重要的内在成像方式;汉代人的忠孝观念、鬼神迷信、升仙信仰和厚葬社会风气等是汉代画像石雕刻工艺与成像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目的、功能之体现。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和人物的衣

冠服饰、车舆、建筑图像和装饰图案设计反映和折射出了汉代和中国古代工艺设计思想发展的一般情况。粉本是汉代画像石雕刻工艺程序,特别是其图像建构的重要手段和成像方式。

本书不是进行汉代画像石通论或进行综合性研究,从汉代画像石的民间美术本体出发,侧重点是研究它的不同制作群体的艺术思维方式、创作方法、审美观念在雕刻技艺和图像建构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等。尽管汉代的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与今天民间艺人们的艺术思维方式、创作方法、审美观念等有一定的区别,但自古及今民间美术家的艺术创作的方法、方式和审美观念等具有原发性、程式化和继承性等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美术创作的方式、方法和审美观念等角度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与成像方式,应该更能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因此,本书力图从理论上寻求汉代画像石的本体研究视角与方法,促进汉代画像石艺术研究。

自近代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汉代画像石的方法、角度多种多样,研究的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从汉代画像石的本体即民间美术的角度进行较系统地研究著作、论文是不常见的,有的只是在著作或文章中间接地提到而已。本书是作者近几年在对国内众多汉代画像石产地的墓室、画像石馆藏等画像石的实地考察和查阅众多有关汉代画像石文献的基础上写出的,选择汉代画像石的本体视角即从民间雕刻工艺与民间美术成像方式角度较系统地研究了它的雕刻工艺和成像方式,希望能进一步促进汉代画像石艺术的深入研究。

目 录

第1章 导论

- 第1节 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历史线索与现状 /1
- 第2节 本书的主题与研究方法 /9
- 第3节 工艺与民间工艺 /15
- 第4节 汉代画像石:一种特殊的民间丧葬雕刻工艺 /28

第2章 材美工巧: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程序

- 第1节 雕刻工艺程序的不同阐释 /37
- 第2节 雕刻工艺程序 /44

第3章 雕绘满眼: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与彩绘工艺

- 第1节 雕刻技法 /61
- 第2节 彩绘工艺 /79

第4章 经营位置:汉代画像石图像的题材内容与布局方式

- 第1节 题材内容 /100
- 第2节 布局方式 /111

第5章 正侧两面:汉代画像石的人物成像

- 第1节 人物成像特点 /128
- 第2节 人物成像思想 /140
- 第3节 人物成像传承 /158

第6章 冠服自然:汉代画像石的冠服与动植物成像

第1节 冠服造型 /164

第2节 动植物成像 /174

第7章 冠盖相望:汉代画像石的车舆、建筑与装饰图案成像

第1节 车舆成像 /189

第2节 建筑成像 /199

第3节 装饰图案设计 /210

第8章 粉本依托:汉代画像石图像的流传方式

第1节 粉本与汉代画像石的粉本设计 /228

第2节 粉本中的外来艺术形象 /242

第9章 物以载道:汉代画像石雕刻工艺与成像的社会思想

第1节 经济基础与政治思想 /253

第2节 神鬼思想与升仙信仰 /265

第3节 汉代画像石与豪族生活方式 /271

第4节 汉代画像石的工艺思想 /279

第10章 剔图刻像(结语) /283

参考文献 /288

后记 /297

第1章 导论

第1节 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历史线索与现状

如果从民间雕刻工艺的角度而言,汉代画像石是产生于西汉文帝、景帝或武帝时期^[1],到东汉时期发展到高峰的一种特殊的民间丧葬雕刻工艺。作为民间雕刻工艺的一个类型,尤其是作为民间丧葬礼俗性的雕刻工艺,其艺术的内容、形式、制作程序、功能、目的和作者等,与历史上的其他民间美术、民间工艺一样,由于受到上层阶级、文人士大夫阶层人等的轻视或不齿。在当时的汉代乃至北宋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其几乎名不见经传、史不见记载,或者说极少被提及。特别是在两汉的史籍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汉代画像石的名称和制作工艺等直接的文献记载。如在《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记载:“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栲栳豫章之木。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及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栲栳榱桷,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或“盛飨宾旅以名”等^[2](图1-1)。这些被记载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汉代盛行的厚葬社会风气情况。文中提到的“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与现出土的山东嘉祥武氏祠“从事武梁碑”文中关于“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等记载比较来看,这种说辞可能指的是包括汉代画像石在内的民间丧葬雕刻工艺活动,但却没有直接提及汉代画像石^[3]。再如《后汉书·赵岐传》中记载他“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有赞颂”。这则记载也不能说明赵岐为自己

[1]关于汉代画像石最早产生的时间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如蒋英矩等先生认为“汉画像石大致产生于西汉武帝以后,衰落或消亡于东汉末年”。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目前出土的汉画像石资料来看,临沂汉画像石产生的时间已早至西汉初年的文景时期”。还有人认为汉代画像石产生于汉宣帝时期等。从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看,“国内至今尚未发现有可靠纪年的汉代画像石祠堂与画像石墓出土”。所以,汉代画像石产生的时间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本书涉及的时段暂用“西汉初年的文景或武帝时期”。

[2]范晔:《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1.

[3]汉画像石这一概念是现代人的称谓,汉代人对其可能有另外的称呼。关于汉画像石不同称谓的问题将在后文论述。

[1]酈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M].长沙:岳麓书社,1995:130.



图 1-1 山东长清县孝里镇孝里铺村孝堂山汉石室

设计的是画像石,也可能是为他的墓室描绘壁画或其他的丧葬图像等。因此,这两则文献记载只能从丧葬礼俗活动这个侧面,反映出汉代画像石在东汉社会中的发展情况。

就目前能查阅到的最早有关记录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形式、制作技艺的文献,大致是东晋末年人戴延之的《西征记》。其中记载:“焦氏山北数里,汉司隶校尉鲁峻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凿而得金,故曰金乡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其后北魏时期的酈道元在《水经注》中除转述戴延之关于济水焦氏山的汉代画像石建筑描述外,还记录了汉代荆刺史李刚等人的画像石墓室、石构墓室、祠堂、石阙、石碑、石庙等情况:“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鳞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制作共丽,不甚损伤”等^[1]。但戴延之和酈道元记载的有关汉代画像石墓室和画像石雕刻的题材内容、形式与雕刻技艺等,是从地理学等角度,把汉代画像石墓室、画像石、石祠堂、石阙等作为记录山脉、水系的标签而记录的,并非直接是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

此后,至北宋之前,关于汉代画像石的情况未见文献记载。北宋

时期关于汉代画像石的最早著录情况,可见沈括的《梦溪笔谈》和米芾的《画史·唐画》两本文献。前者说:“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鲋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幘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1]。该段文字较详细地描述了汉代济州大司徒朱鲋墓中雕刻的画像石艺术图像,并把其观察到的朱鲋墓画像石所刻人物的衣冠服饰与生活用品,与北宋人的衣帽、生活用具作比较,发现了它的“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的社会历史价值。后者记载了朱浮(疑为朱鲋)墓室中的车马出行图及其铭刻的榜题^[2]。但这两则关于汉代画像石的记述都是缘事而发,并非学术性研究著录。北宋中期以后乃至清代,赵明诚、洪适和黄易等金石学家们把汉代画像石纳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并对石头及其拓片进行收藏、整理。尤其是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不仅收录了“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增加了对汉画像内容的描述和简单的考证”,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汉画像石著述”。元明两朝,金石学衰落,有关汉代画像石的著述寥若晨星。从清代前期到20世纪初期,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和金石学再次复起,学术界再次激起了研究和著录汉代画像石的热潮。出现了黄易、王昶、翁方纲、冯云鹏兄弟和瞿中溶等一批著名的汉代画像石研究学者和重要的汉代画像石研究专著等,虽然这段时间主要是对金石学的研究阶段^[2],但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再次拉开了序幕。

民国时期,汉代画像石研究在清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近代国外考古学思想与方法的影响下,国内汉代画像石学者、考古学家们开始进行田野调查、田野考古研究。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古发掘,随着汉代画像石墓室不断被发掘、汉代画像石不断出土,不仅汉代画像石的考古、考古学研究逐渐深入,而且文化界、艺术界、史学界和哲学界等一些知名人士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汉代画像石及其拓片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并且汇聚了

[1]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2):124.

[2]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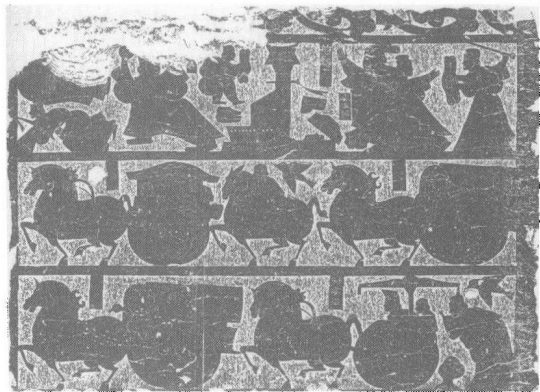


图 1-2 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龕西侧画像

东汉 山东嘉祥县武宅山村北出土 嘉祥县武氏祠保管所藏

一大批如董作宾、张嘉谋、孙文青、罗震、容庚、夏鼐、鲁迅、常任侠、滕固和郭沫若等汉代画像石研究专家(图 1-2)。先后研究、整理、发表与出版了如《汉武梁祠画像录》(容庚著)、《汉武梁祠画像考释》(容庚著)、《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及风格的考察》(滕固撰写)等一批重要的汉代画像石研究图录、专著和学术文章^[1],为汉代画像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物、图像和文字资料。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内汉代画像石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 60 年的时间里,由于政府有关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经过一大批考古界、文化界、艺术界、史学界和哲学界的汉代画像石墓室、祠堂和汉代画像石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四川、重庆、安徽、山西、浙江、云南、贵州、天津、北京和湖北等省市的不同地区发掘出众多的汉代画像石墓室、祠堂和石阙等,计有汉代画像石一万多块(图 1-3)。尤其是先后在不少省、市、县改建、扩建、新建了一批汉代画像石专题性陈列馆和辟建了不少汉代画像石展览馆等,对汉代画像石进行收集、整理、保护、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图 1-4、图 1-5)。在研究方面,1954 年曾昭燏主持的山东沂南北寨村汉画像墓的发掘与研究,拉开了新中国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序幕^[2](图 1-6)。从此,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分别从考古学、艺术学、美术学、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对汉代

[1] 王健中,《汉代画像石通论》[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27-31.

[2] 杨爱国,《五十年来的汉画像石研究》[R]//曾昭燏,蒋宝璋,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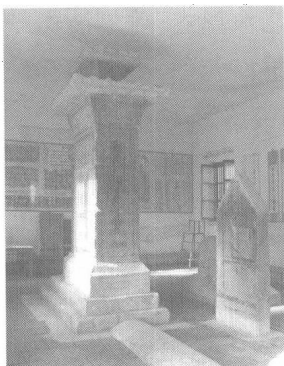


图 1-3 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石阙东汉
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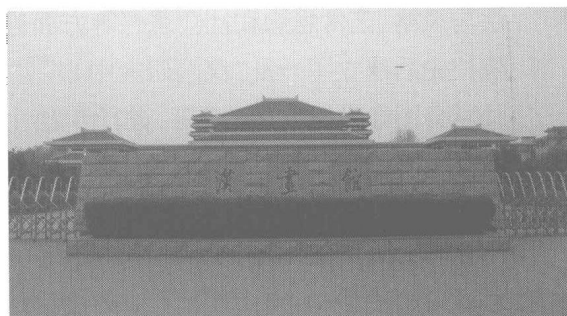


图 1-4 河南南阳市汉画馆新馆



图 1-5 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新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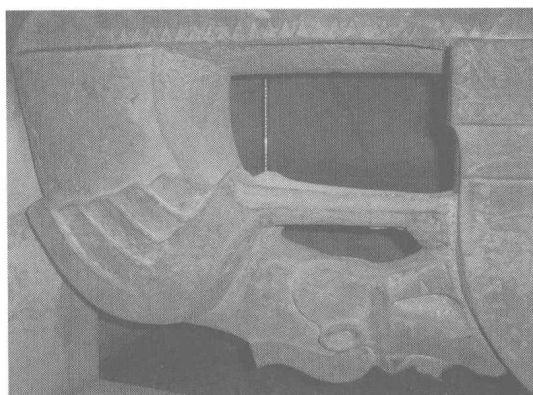


图 1-6 龙头(局部) 山东沂南县北寨村汉画像石墓

[1]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8.

画像石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分区,对其题材内容、艺术形式、雕刻技法与风格、艺术思想和社会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些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一批“汉画研究中心”、“汉画艺术研究所”和“中国汉画学会图像学研究中心”等,进行专题性研究(图 1-7)。1989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汉画学会”,迄今为止,吸收会员达数百人,先后组织召开了十一届“中国汉画学会”年会,出版了年会论文集等(图 1-8)。在汉代画像石的研究队伍建设方面,随着汉代画像石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入而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来培养、吸收了一大批高素质、高学历的专业及相近专业不同学科的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参与研究。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方向发展,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汉代画像石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专著、图录等,可谓“汗牛充栋”。体现出“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汉画像石的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即综合研究阶段”^[1],为深入研究汉代画像石奠定了坚实的资料、思想与人才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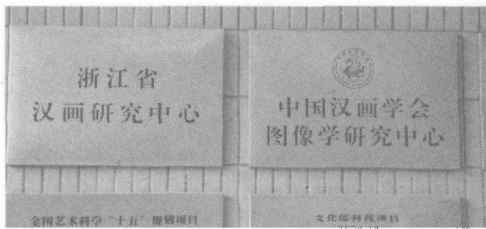


图 1-7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浙江省汉画研究中心 中国汉画学会图像学研究中心



图 1-8 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现场



图 1-9 山东长清县孝里镇孝里铺村孝堂山汉石室

在国外,如果从 1881 年在德国柏林东方协会展出斯蒂芬·布舍从中国带回的一套汉代画像石拓片算起的话,国外学者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也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该次展览 5 年后,米勒又收集了另一套拓片并赠给大英博物馆,这两起事件标志着西方最早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介绍,激起了若干汉学家到实地调查研究这类资料的欲望。较早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是法国学者沙畹。他于 1891 年到了山东嘉祥县武梁祠、长清县孝里镇孝里铺村的孝堂山等汉代画像石墓室、祠堂考察,1893 年出版发行了著作《中国两汉石刻》,第一次把一套完整的汉代艺术图像和文字资料介绍到西方^[1](图 1-9)。进入 20 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除沙畹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外,先后有日本学者关野贞、大村西崖、秋山进午、长广敏雄、土居淑子、林巳奈夫、曾布川广宽和佐原康夫^[2],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德国学者奥托·菲舍、路德维希·巴卡霍芬,英国学者威廉姆·安德逊、劳费和美国学者费韦梅、乔治·诺理、亚历山大·苏培、理查德·鲁道夫、布林、柏格、简·詹姆斯和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等,都对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墓室、祠堂和汉代画像石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先后出版、发表了《中国山东汉代墓葬的装饰》(关野贞)、《在中国的考古调查》(色伽兰)、《汉代中国绘画》(奥托·菲舍)、《四川汉代画像石》(理查德·鲁道夫)、《武梁祠堂: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巫鸿)等一批著作与学术论文,为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

[1]巫鸿:《海外百年:汉画像研究之回顾》,《中原文物》,1994(1)。

[2]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9。

[1] 杨爱国. 五十年来的汉画像石研究/朱青生主编. 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主题与范围方面,主要侧重于图像内容的考证与解读、史料价值的挖掘和艺术功能的阐释这三个方面^[1]。这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表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出版的研究专著或涉及有关题材内容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等,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不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图像内容的考证与解读上,对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像及其故事情节、人物(神话、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等)、动植物、车马出行、建筑形象、家具和榜题等进行了考证与解释,既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各方面学者着墨最多的,又是极其必要的。也就是说,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也不论对出土的汉画像石作综合性或是区域性研究,甚至就某一图像的细节作个案研究,首先都要清楚地了解图像的基本内容——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两汉乃至前后的社会、艺术、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发生、发展等情况。只有弄清楚了其中的视觉形象、含义、形象之间的关系等图像志,才有可能对其背后隐含的图像学意义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范围方面,学者们对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进行了综合研究或进行通论,不少学者依据不同地域如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等汉代画像石出土地,对其图像特点与风格、艺术形象与思想表达等展开了研究。随着交叉性学科研究的深入,使汉代画像石题材内容研究较广泛地涉及了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文化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研究方法方面,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和西方文化艺术、学术研究思想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国内有不少学者采用或借鉴了西方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考古学、历史学、图像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哲学、美学,以及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等思想、理论与方法,用于对汉代画像石发生、发展和构成方式及反映出的社会思想、哲学观念等进行系统研究,使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